

中国共产党数字领导力的构成要素与实践要求

◎ 单景泽 李全喜

[摘 要] 中国共产党数字领导力是因应数字时代背景而生的概念，体现了数字化变革与中国共产党的双向互动。中国共产党数字领导力在目标、变革与愿景维度中形成了自身建设的整体逻辑：价值逻辑、主体逻辑与效用逻辑。中国共产党数字领导力涵盖数字认知力、数字引领力、数字决策力、数字协调力、数字动员力以及数字文化力六大要素，这也为党的数字领导力建设提供了实践理路，即推动数字理念变革、健全“数治”平台、优化数字领导力绩效。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数字领导力；整体性逻辑；要素建构

[中图分类号] D25 **[文献类型]** A **[文章编号]** 2095—7270（2024）04—0041—09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23年度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研究专项“关于新时代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经验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单景泽，北京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李全喜，北京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

伴随物联网、移动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从信息时代向数字时代跨越的历史时期。在信息时代，人们借助信息化手段对物理世界进行改进和提升，人们的思维模式依然停留在将信息技术作为工具的流程化思维。在数字时代，人与人之间沟通协作的生产流程已然可以通过数字化技术在数字世界实现，此时数字技术对社会治理的深刻影响，便从工具性因素转向变革性因素，进一步形塑人们的数字化思维模式，推动治理变革和社会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激发数字经济活力，增强数字政府效能，优化数字社会环境，构建数字合作格局，筑牢数字安全屏障，让数字文明造福各国人民。”^{〔1〕}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的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在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中处于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地位，是引领和推动中国社会培育数字化思维、实现数字化变革的关键政治力量。中国共产党的数字领导力建设正是建设数字文明，实现人民在数字时代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必然要求。

一、数字情境下的中国共产党数字领导力

领导力是一个管理学范畴的语词，一般来说，领导力是领导者指向组织目标、愿景和变革的一种影响力^[2]。领导力在个体层面体现为塑造他人行为和价值观的权力^[3]，在团队层面是影响一个团队实现愿景或目标的能力^[4]，在组织层面是指组织成员的集体活动，涉及确定组织的发展方向、创建成员之间的联合以及获得成员承诺积极投入工作中去的综合能力^[5]。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的四个构成要素，“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6]。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更多表现为组织层面的领导力，并通过领导各类组织将领导力转化为社会改革发展的动力与合力。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是中国共产党立足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建构目标和愿景的思想引领力和社会号召力，以及推动社会变革发展的政治领导力和群众组织力。

“数字领导力”最早是21世纪初由国外学者艾沃利奥（Avolio）等人提出的，他最初将其定义为“信息技术引发的领导者在观念、情感、行为等方面的转变与影响过程”^[7]。之后，艾沃利奥意识到应在组织层面动态考察领导行为，将领导活动嵌入组织管理过程，又将数字领导力更新定义为“信息技术嵌入组织管理情境下，领导者个体情感与行为转变以及影响组织绩效的过程”^[8]。之后，一些中外学者也对数字领导力进行了界定，这些界定基本都由数字技术与组织管理、领导者情感与行为转变、影响组织绩效三个维度构成。

充分理解中国共产党数字领导力的内涵，需要在词源层面回归领导力的定义，从主体层面探讨党的领导力的概念界定，最终以数字时

代为关键变量理解中国共产党数字领导力的科学内涵。以领导力和数字领导力概念界定的学术文献史梳理为基础，中国共产党数字领导力的内涵建构既需要以数字技术为时代背景，将其作为影响政党、国家与社会的变革要素；也需要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主体，从宏观组织层面理解其建构目标愿景、推动变革发展的领导过程。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的数字领导力是中国共产党及其各级党组织、领导干部主动适应数字时代，以数字理念和数字思维武装自身，并以数字文明的目标和愿景引领全社会，带领其他组织、团队与个人推动数字化变革，深刻改变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的领导过程。

二、中国共产党数字领导力的构成要素

中国共产党数字领导力包含三重维度：第一重是目标维度的价值逻辑，数字领导力建设最终是为数字时代人民群众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服务，因而要引导数字化变革惠民利民、便民为民；第二重是变革维度的主体逻辑，加强数字领导力建设需要不同组织、团队及个人共同发力，形成一个运行有效的领导体系，并最终转化为推动数字变革的社会合力；第三重是愿景维度的效果逻辑，中国共产党的数字领导力建设为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服务，最终的愿景是以数字领导力耦合善政与善治，最终建立起数字文明新形态。“目标引领—变革主体—变革愿景”的分析框架为全过程阐释中国共产党数字领导力的整体逻辑提供了一个政治学、管理学和领导科学的复合视角。

（一）价值逻辑：引导数字化变革惠民利民、便民为民

从目标维度看，中国共产党数字领导力建

设的目标是带领全社会推动数字化变革,其价值归宿无疑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201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古往今来,很多技术都是‘双刃剑’,一方面可以造福社会、造福人民,另一方面也可以被一些人用来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民众利益”^[9]。中国共产党数字领导力的价值逻辑便是要推动数字化变革真正造福人民,避免数字技术在形塑社会的同时异化社会,尽最大可能减弱数字鸿沟、数字壁垒、数字垄断等技术衍生问题的社会影响。

党的数字领导力建设引导技术变革向善向好,更加惠民利民。数字技术是借助一定设备将图、文、声、像等信息转化为二进制数字后,将数字加以运算、加工、存储、传送、传播、还原的技术。从生产力的构成要素看,数字技术推动劳动者之间的链接从平面式走向立体、折叠的交互式,省去了诸多中间节点,大幅度提高了经济效率。与此同时,在数字技术的影响下,生产资料在算力、算法上展现出高链接性、强渗透性、泛时空性,劳动对象也从以往的物质实体向数据这一新型劳动对象转化。技术变革的历程也就是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于社会生活的进程,在这一过程中,人性的复杂多元难免给技术变革增添主观色彩,数字鸿沟、数字壁垒、数字垄断等技术衍生问题自然也成为需要重点关注与管控的社会问题。也正因此,以正确的价值目标引领技术变革,推动技术向善是中国共产党数字领导力建设的任务之一。中国共产党的数字领导力建设综合运用政策与法律体系、道德与伦理体系构筑技术变革的“底线”与“上限”,从而影响数字技术应用的市场准入机制和市场竞争机制,通过价值引领的方式规避数字技术的异化问题,放大数字技术在促进经济交往、提升经济效率方面的功能,使得技术变革更加惠民利民。

党的数字领导力建设推动党政组织数字化转型,更加为民便民。数字技术在改变物质生产方式的同时,也将社会政治交往中的主体有机连接起来,这种实时的连接强化了组织与个体间的双向作用力,推动了党政组织的数字化转型。在组织向度上,中国共产党的数字领导力建设推动了党政机关大数据平台的构建,将人民群众社会生活中纷繁复杂的现实图景可视化便于计算、衡量、决策的“人民大数据”。纵向看,党政机关大数据平台的构建有助于深度、精准把握民之所想、民之所需、民之所困,将复杂模糊的民意清晰化,更好地实现党政组织的“回应型治理”;横向看,党政组织对人民大数据的掌握有助于明晰各领域工作的权重,共建符合群众所需的政策偏好,实现党政机关资源的有效配置,真正在治理过程中贯彻群众观点与群众路线。

中国共产党的数字领导力建设推动了移动互联网与即时通讯技术在政务服务领域的广泛使用,让人民群众的意见诉求能够直达决策监督部门。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各单位陆续建立“接诉即办”政务服务平台,既畅通了民意表达渠道,又实现了政务公开处理,促使相似的民意形成一股社会合力,对党政机关推进政务服务形成外部动力。党的数字领导力增强了党政机关与人民群众、组织与个体之间的双向互动,党政机关通过大数据平台更加贴近群众,群众依靠移动互联网和即时通讯技术构建的传播平台实现“扩音”,推动党政组织的数字化转型更加为民便民。

(二) 主体逻辑:“一核引领、多元共治”的领导体系

中国共产党的数字领导力建设需要多元社会主体共同发力,形成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数字领导体系,这是中国共产党数字领导力建设的主体逻辑。这一数字领导体系内含四个主

体：中国共产党及其各级党组织的政党主体、各级人民政府的行政主体、数字生产相关企业的市场主体以及基层社区、社会组织与公民的社会主体（如图1）。

中国共产党作为政党主体通过愿景引领和组织领导两个主要传导路径在数字领导力建设中起着“一核引领”作用。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层面提出了“加快建设数字中国”^[10]和“让数字文明造福各国人民，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11]的发展愿景，将数字技术作为赋能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要素，以数字化培育新动能，以新动能推动新发展。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建设上不仅将数字技术作为社会生产力的关键要素，还将数字技术作为时代发展的主要特征，提出了“数字文明”“数字中国”等概念。在形象建构上，中国共产党具有拥抱新事物、锐意创新的鲜明特质，继承了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12]。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

域全过程，成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技术要素。这场数字化变革也正在深刻改变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为全体人民构建起数字变革的美好愿景。

中国共产党具有独特的组织优势加强数字领导力建设。参与数字化变革的行政主体、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是多元异质的。而不同参与主体各异的行动逻辑也对数字化变革的意见整合形成一定挑战。中国共产党是统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领域各方面的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党的领导制度是国家的根本领导制度，这种全方位、全领域全过程的领导力量有助于破解各主体内部及不同主体间的数字壁垒，进而降低数字化变革的协同成本。

在纵向维度上，中国共产党通过上下级党组织的数字领导关系搭建上传下达的纵向治理网络，不断破解科层制难题。每一级地方党组织都是该行政区划内的核心领导力量，引领属地数字化变革。各级党组织既是数字化变革的领导者，也是受益者。数字技术成为上下级党组织信息传递、数据共享、平台搭建的关键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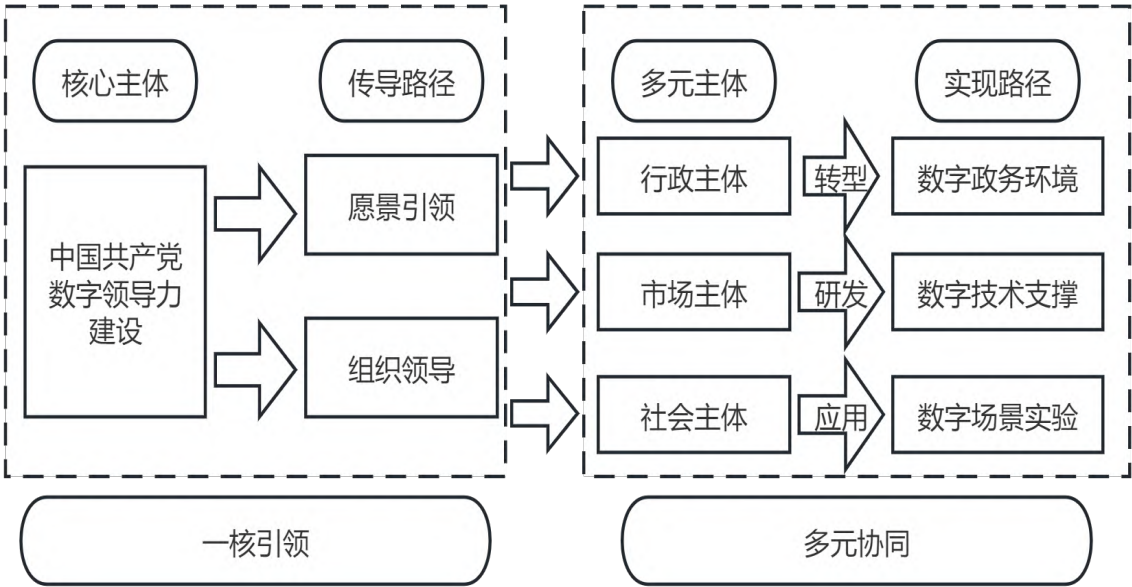


图1 中国共产党数字领导力建设的主体逻辑

成要素，在党中央关于数字中国建设政策精神的指引下，各级党组织充分掌握宏观信息与微观数据，通过数字化平台实时追踪数字化进程，破解科层制所带来的信息障碍，搭建上下同步、上下共享的纵向治理网络。

在横向维度上，中国共产党具有协同政党主体、行政主体、市场主体与社会主体的制度优势。在百余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逐步建立起广泛联系党外人士的新型政党制度。在新时代，党可以通过数字技术将横向维度的制度平台数字化，实现对多元主体跨越时空的数字连接，促使市场主体与社会主体关于数字化变革的建议与资源有效流动。在“一核引领”下，市场主体与社会主体既在纵向治理网络中接受每一级党组织在数字化变革中的领导，又在政治协商会议等横向治理平台中参与数字化变革议程，为其提供技术与智力支撑。总体而言，中国共产党在数字领导体系中的“一核引领”是以党的组织与制度体系为纵横网络，以数字连接为时代特征。

在多元共治的领导体系中，行政主体、市场主体与社会主体都在数字化变革中发挥重要作用。数字化变革主要涵盖生产方式变革、生活方式变革和社会治理方式变革。行政、市场与社会三种主体各自均参与三大变革，但也各有侧重。其中，行政主体通过数字政府建设，营造数字政务环境，推动社会治理方式变革；市场主体通过参与市场竞争，提升数字技术水平，为各主体的数字化变革提供技术支撑，最终推动生产方式变革；社会主体通过应用数字技术，提供技术实验场景，让技术走进生活，推动生活方式变革。

（三）愿景逻辑：以数字领导力耦合善政与善治

中国共产党数字领导力建设的主体逻辑表明，数字时代万物互联的特征必然将多元主体

共同纳入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的变革历程中。建设数字文明需要将多元主体共同纳入数字化变革议程，党的数字领导力建设的愿景便是耦合善政与善治，让各主体的独特优势在数字化变革中充分释放。数字时代风险与机遇并存的挑战要求中国共产党既做善政的主导者，也是善治的仲裁人，党的数字领导力建设便是联结善政与善治的耦合节点。党的数字领导力建设需要在巩固领导核心的基础上全面把握新时代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引领性、公共性和服务性倾向。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体系在理论和制度上具有适应数字时代的独特优势。从党内视角看，民主集中制作为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既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和行动，有效防止和克服了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分散主义，有助于以坚定且一致的步伐拥抱数字时代，以制度的稳定性应对数字时代的各种风险挑战；又注重发扬党内民主，按时按需多频次听取下级党组织和党员群众意见并予以解决和回应，有效防止移动互联时代不满情绪的产生与扩散。在社会视域下，中国共产党所具有的新型政党制度同时具备善政与善治的特征。在新型政党制度中，党是决策议程的启动者，是数字化变革议程的领导者与引领者，起到方向把握和议程规范的作用。与此同时，新型政党制度广泛纳入社会多元主体，充分保障了党内的信息共享与共同决策，将各方建议进行有效整合。也正因如此，中国共产党的数字领导力建设自然成为数字化变革中耦合善政与善治的联结点，成为建设数字文明的关键节点。

中国共产党数字领导力中的“善政”体现为对数字化变革的统筹，对数字化进程的支持，有助于扩大数字技术发展的时代红利；其中的“善治”则体现为对数字化变革成果的合理分配，以全过程人民民主构建共享的数字共同体，

跨越数字鸿沟，实现数字文明的普惠性。以党的数字领导力建设耦合善政与善治，推动数字文明建设是组织变革的愿景，是社会发展进步与社会公平正义的有机统一，这也要求党的数字领导力建设要坚持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以全过程人民民主为支撑，以数字技术为新纽带，携手共进数字文明时代。

三、中国共产党数字领导力的实践要求

数字时代对于中国共产党这一百年大党而言是历史机遇，也是历史挑战。中国共产党的数字领导力建设无疑是一次全面深刻的理念变革、组织变革、方式变革，这一次变革的内部结构是党的制度体系，外部环境是数字时代的机遇与挑战，组织变革便在内部结构与外部环境的相互作用中动态发生。组织变革的过程包含“解冻、变革和再冻结”三个阶段^[13]，党的数字领导力建设亦是如此，在三个阶段所需的领导力要素各异，这也为党的数字领导力建设提供了实践指引。

在解冻阶段，党的数字领导力建设要让全体党员明确推动数字时代组织变革的必要性和重大意义，克服因面对新形势、新环境、新任务而产生的“本领恐慌”。党的数字领导力建设需要融入数字认知力和引领力，通过谋划愿景、设计变革方案，凝练核心价值观等方式激发组织成员变革动力^[14]。

在变革阶段，党的数字领导力建设要通过实施变革方案，推动组织向变革目标方向发展。变革阶段需要组织领导者更好地协调各方利益诉求，保障多元主体在数字文明的建设道路上稳步前行，充分认识到数字化变革的益处。党的数字领导力建设需要以数字技术为依托提升数字决策力和协调力。

在再冻结阶段，数字化变革的成果需要以规章制度的形式加以确认，以便于数字化变革进程以一种更加平稳的状态持续推进，确保数字文明建设常态化，这一阶段党的数字领导力建设要融入数字动员力和文化力要素，更好地评估各级党组织领导者对于数字化变革的态度、参与程度和实施效果。

基于此，中国共产党的数字领导力建设在实践要求上分为六个方面，分别是数字认知力、数字引领力、数字决策力、数字协调力、数字动员力和数字文化力（如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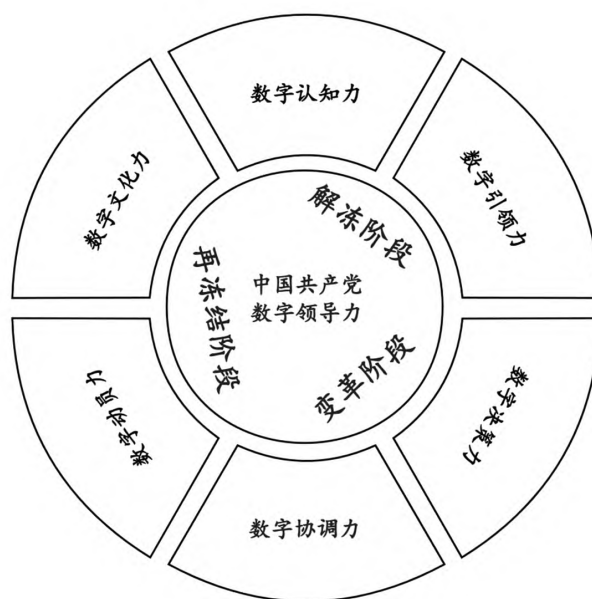


图2 中国共产党数字领导力的要素建构

（一）推动数字理念变革，强化数字认知力和引领力

中国共产党数字领导力建设首先要在全党形成推动数字化变革的理念，这一集体理念的形成需要通过培育数字思维、谋划数字愿景的方式，有效整合领导干部的思想观念，最终强化数字认知力和引领力。

强化数字认知力就要在理论与实践过程中培育领导干部科学的数字思维，突破认知误区。时至今日，依然有部分领导干部片面地将数字

化变革理解为“上网”“上线”，导致部分地区出现政务 App 横行，以数字化为名加重基层“指尖形式主义”的怪象^[15]。数字思维的主要内容是强调运用数字技术和数据分析手段快速获取、整合和分析信息，以更加有效地解决问题和推动创新，因此其重要特性是整合性和共享性，而不是建立起并不互联互通的网站与软件。

与此同时，部分领导干部也对数字时代的“领导替代”存在误解。在数字时代，随着组织等级界限的模糊与去中心化，数字是否会消解领导特质？在现实中，组织结构的扁平化所消解的是冗长的行政指挥链与等级森严的科层制特征，而扁平化带来的管理幅度增加以及由知识型下属崛起带来的人本主义导向促使领导者在愿景规划、资源分配、跨部门协调与沟通方面反而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16]。因此，数字化变革并不会消解领导干部在组织中的重要作用，领导干部也不能完全依赖数据做决策，将数字化作为懒政怠政的托词。要强化数字认知力，就要在突破认知误区的基础上，培养领导干部开放共享、多元协同的正确数字观，避免数字化变革之路走偏走歪。

强化数字引领力要同时注重思想引领与组织引领。要注重梳理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并按照数字政党、数字政府、数字经济、数字社会的视域逻辑进行分类研究，为党的数字领导力建设提供思想引领。与此同时，思想引领也要注重话语体系建设，要加强对数字中国、数字文明等重要愿景的通俗化表达，让广大党员干部明晰数字化变革的未来图景，增强参与数字化变革的自我效能感。强化数字引领力也要注重组织引领。各级党委可以组织成立数字化改革领导小组，由党和政府主要领导担任组长，统筹辖区内的数字化改革工作，推动数字技术赋能社会生产、

社会生活与社会治理，以政治势能激发数字化变革的强大动能。

（二）健全“数治”平台，提升数字决策力和协调力

中国共产党是社会多元主体的领导核心。在党引领数字化变革，推动数字领导力建设期间，要做好协同各方的工作，以民主集中的原则提升数字决策力和协调力。“数字纪元里，组织不再是构架精巧的、由一个领导者操控、实现上级意图的机器；而是由无数灵活、液态的自组织在完成各种工作、贡献各自的价值，并统一于共同的宏观愿景”^[17]，因此在数字化变革中，党的数字领导力建设需要依靠“数治”平台协调各方在其中发挥自身独特优势，最终统一于数字化变革的宏观愿景。

“数治”平台建设的核心要义之一是实现数据开放共享，以便于社会多元主体能按需取用数字化建设的“原材料”。党政机关可以尝试牵头建立一体化、智能化的公共数据平台。中国共产党具有点面俱全的纵横治理网络，各级党组织都是数据获取的重要抓手。各级党组织与政府机关要拆除数据围墙，组织建立全社会共享的公共数据平台，同时完善数据准入机制和数据安全机制，保障数据的有效性和保密性，释放全社会多元主体参与数字化进程的强大动力。

依托数据科学决策、精准服务是“数治”平台的重要任务。在决策端，党政机关的各部门要在核心业务数字化的基础上运用数据科学决策，既要在决策前运用数据进行风险预警和决策模拟，又要在决策执行中加强追踪监管与服务保障，也要在决策后做好数字评估和成果运用，确保数字化决策形成逻辑闭环，更好地实现党政机关的高效协同。在服务端，党政机关要整合同类型的数字平台，实现“一网通办”“一网通管”“一键办理”，在简约高效的

基础上推动数字化服务全流程的公开透明，形成对政务服务的有效监管。

数字赋权是“数治”平台构建的可行路径。数字赋权是推动敏捷治理、韧性治理的重要路径，在重大风险挑战层出不穷的新时代，基层行政主体、市场主体与社会主体是直面问题的前沿阵地，也具有较强的敏捷感知、快速调适与自我修复能力。党的数字领导力建设要通过数字赋权基层行政主体避免资源配置倒挂，走向扁平化、基层化的社会治理，让基层行政主体获取更大的自主性，灵活应对风险挑战，推动数字化变革。市场主体与社会主体亦是如此，数字赋权使得这两类主体在技术、资金、资源等方面的独特优势得以充分发挥，提升党的数字领导力的韧性。

（三）优化数字领导力绩效，激活数字动员力和文化力

数字化变革的演进是未来趋势，党的数字领导力建设自然也需常治长效。数字化变革的成果要以制度形式固定下来，以更好地推动数字化变革平稳运行，这就要求党的数字领导力建设融入数字动员力和文化力，优化数字领导力绩效。领导干部作为“关键少数”是推动数字化变革的实践主体，因此优化数字领导力绩效是党的数字领导力建设的重要一环。

优化数字领导力绩效首先要建立起数字领导力的考核指标体系。既要数字认知力、数字引领力、数字决策力、数字协调力、数字动员力和数字文化力作为数字领导力的评估维度，又要侧重对客观事实变化的评估，侧重对领导干部属地范围内数字政府、数字经济、数字社会建设实际成效的考评。因此，在建立数字领导力的考核指标体系过程中要切忌“就数字论数字”，不能单纯以数字化程度判断数字领导力的好坏，要让技术回归生产生活，以人民群众对于“开放共享、多元协同”的感知为

第一考核指标。在考核指标的设置中，也要注重各主体协同，侧重基层行政单位、市场主体与社会主体的直观感受，避免“运动员”与“裁判员”的身份重叠，让数字领导力的考核指标真正回归人民群众。

优化数字领导力绩效要鼓励创新精神，完善容错纠错机制，建立绩效机制而非惩处机制。数字时代涌现的新生事物，对于每一位领导干部来说都是新兴且复杂的事物，数字领导力建设的范畴涵盖党内党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变量众多，需要全党上下共同探索、加强协商，而非一日之功。因此优化数字领导力绩效要鼓励各级领导干部敢想敢试，厘清“底线问题”与“历史局限性”的区别，数字领导力建设的底线就是人民群众的数字权益，领导干部如果有侵害人民群众数字权益的主观犯意，便是底线问题；如果是数字认知力有限所造成的认知误区，那便适用于容错纠错机制，以免领导干部特意规避数字化变革，使得组织文化陷入停滞不前的窠臼。

优化数字领导力绩效要切实将考核指标纳入领导干部的目标责任制考核，量化目标，形成“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劣者汰”的正确导向。领导干部数字领导力的考核机制应当成为干部选拔、任用、考核的重要风向标之一，这不仅反映了领导干部在数字时代的履职成效，也体现了其对于勤政创新的态度认同。党的数字领导力绩效是数字时代组织有效应对创新不确定性、激励地方创新的制度设计。数字领导力绩效可以通过量化数字领导力的构成要素，客观呈现领导干部引领数字化变革的动力与成就，让目标与责任更加清晰。

中国共产党的数字领导力建设是新时代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党的建设的又一重要体现，也是化解重大风险挑战，拥抱新的历史机遇的必然要求。中国共产党数字领导力建设的内在

逻辑明确了推动数字化变革的目标、主体与愿景，其六大要素的建构则从实践要求上为党的数字领导力建设提供了可行方案。中国共产党作为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高政治领导力量，也是数字化变革的领导核心。党的数字领导力建设必然对社会生产、社会生活与社会治理的全方位、全领域、全过程产生深刻影响，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产生重要推力。■

【注 释】

- [1][11] 习近平书信选集：第1卷[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362，362.
- [2] 柴宝勇，李梓琳.“领导力”的理论溯源与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的理论观察[J]. 管理世界，2021，37(08)：11-20.
- [3][美] 埃德加·沙因. 组织文化与领导力（第4版）[M]. 章凯，罗文豪，朱超威，等，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3.
- [4][美] 斯蒂芬·罗宾斯，（美）蒂莫西·贾奇. 组织行为学（第16版）[M]. 孙健敏，王震，李原，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295.
- [5][美] 辛西娅·麦考利，（美）埃伦·范·韦尔索. 领导力发展手册（第2版）[M]. 翁文艳，文茂伟，房欲飞，等，译. 上海：格致出版社，2008：453.
- [6]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15.
- [7] Avolio B J, Kahai S, Dodge G E. E-leadership: Implications for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J]. The

Leadership Quarterly, 2000, 11(4): 615-668.

- [8] Kahai S, Sosik J, Avolio B J. Effects of Participative and Directive Leadership in Electronic Groups[J]. Group and Organization Management, 2004, 29(1): 67-105.
- [9] 习近平. 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5.
- [10] 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26.
- [12] 习近平.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3.
- [13] Lewin K. Field Theory in Social Science[J]. American Catholic Sociological Review, 1951, 12(2): 103.
- [14] 杜孝珍，代栋栋. 公共部门数字领导力的结构维度与建设路径[J].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22，23(06)：70-83.
- [15] 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防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的若干意见[EB/OL]. (2023-12-18) [2023-12-19]. http://www.cac.gov.cn/2023-12/18/c_1704564095028266.htm.
- [16] 郝旭光，张嘉祺，雷卓群，刘文琦. 平台型领导：多维度结构、测量与创新行为影响验证[J]. 管理世界，2021，37(01)：186-199.
- [17] 林光明. 数字时代的组织、人才与领导力[J]. 清华管理评论，2019(Z2)：89-95.

责任编辑：张国玉